



上海市“体教结合”运行模式现状与对策

舒盛芳¹, 盛茂武², 许俊华², 徐敬祥¹, 李金娟¹

摘要:以上海市27所中学“体教结合”运动队作为研究对象,对昆明学校、杨浦高级中学等学校的教练员和体育组长,以及市、区体育局等领导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杨高模式”、“昆明模式”是现行“体教结合”中的基本运行模式,但在“体教结合”运行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科学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上海市;体教结合;运行模式

中图分类号:G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207(2007)04-0006-06

Status Quo of the Operating Mod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Shanghai

SHU Sheng-fang, SHENG Mao-wu, XU Jun-hua et al.

(Shanghai Institute of P.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sports teams featuring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in 27 middle schools in Shanghai as the subjects and by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the opinions of the coaches and the heads of the PE teaching groups in middle schools and the leaders of the municipal and district sport administration were obtained. It is discovered that the Yangpu High School Mode and Kunming School Mode are the principal operating mod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Some scientific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solve the existing problems.

Key words: Shanghai; integration of sports and education; operation mode

1 前言

上海市体育局为了更好地落实“体教结合”工程,成立了“体教结合”办公室,指定了27所试办二线队伍的中学。作为试办中学,它们在“体教结合”中具有一定的典型代表性。“体教结合”在具体的操作过程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它们在试办过程中自身适应性怎样,存在哪些问题,面临什么困境,都需要我们从各个层面上进行认真总结,以便为进一步在全市铺开和大面积推广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通过对体育局所选择指定的27所试办二线队伍的中学作为研究对象来探讨“体教结合”的运行状态及其存在的问题,以达到“窥斑见豹”的效果。这对于推动上海市“体教结合”工程,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对象与方法

以上海市体育局指定的27所中学“体教结合”运动队作为研究对象。对昆明学校、杨浦高级中学、复兴中学的教练员和体育组长,以及市、区体育局等有关学校的教练员、领导进行访谈。制定2份问卷并对教练员和学生运动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时间为:2006年10月20日-11月25日。

3 结果与分析

3.1 “杨高模式”、“昆明模式”,是现行“体教结合”中的基本运行模式,体育局在“体教结合”中其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根据调查,我们按照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人事所在编制和归属,将其运行模式归纳为以下几种基本模式。第一种模式,

即杨浦中学模式,简称为“杨高模式”,即教练员为学校教师,属于教师编制。教练员除了承担运动队的运动训练任务之外,还要承担体育课的教学任务。运动队属于学校管理。学生运动员除了参加运动训练之外,一切要求同普通学生一样。第二种模式,即昆明学校模式,简称为“昆明模式”,把少年体校的游泳项目放到普通中学,学生运动员学习在普通中学,受学校管理。运动训练则由体校教练员负责。教练员的编制属于体校。第三种模式,简称“混合模式”,即兼有“杨高模式”和“昆明模式”的特点。负责“体教结合”训练任务的教练员既有来自学校的安排的体育教师,也有来自体校安排的教练员。如果只有一个运动队,往往以体校的教练员为主,体育教师担任副手。

我们主要探讨“昆明模式”和“杨高模式”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各有特点,在向市体工队和高校输送体育人才方面都已经发挥了实质性的作用,目前已经成为“体教结合”两种基本模式。对于“杨高模式”,体育局系统在其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显现。表现在,第一,体育局系统没有明确具体的经费投入,缺乏实质性“介入”。第二,运动队由学校管理,学校有充分的自主权。体育局在政策和具体工作指导方面还不够深入,存在职责不明,配合不够顺畅,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不到位等倾向。

对于“昆明模式”,由于是由业余体校和学校的共建,其实质也就是体育局系统和教育系统的共建。学校负责学生的文化学习,体校负责学生的训练(学生训练和比赛经费也由体校负责)。体育局系统主要通过教练员的训练和比赛来影响运动队。相对于“杨高模式”来说,体育局系统的作用体现比较充分、明显。

收稿日期:2007-03-28

基金项目:上海市体育局体育社会科学、决策咨询研究项目(SKYJ150914200635)

第一作者简介:舒盛芳(1963-),男,湖南溆浦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学校体育与体育社会学

作者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理论教研室,上海 200438,2.上海市体育局,上海 200020



有种种迹象表明,体育局在“体教结合”的推进过程中“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原因有:第一,体育局系统有少数人思想开放程度不够,仍然在抱着发展业余体校的幻想不放,而在“体教结合”上迈不开步。第二,“体教结合”目前还没有成功的典型经验可以效仿,业余体校发展虽然面临很多困境,但也不敢轻易把一个经营了几十年的发展模式一夜之间就抛弃,风险太大。而另一个方面,“体教结合”最终效果还没有得到验证。在权衡各种利弊之后,有的人认为当前最保险的做法就是采用“两条腿走路”,即在推行“体教结合”的同时,充分发挥现有业余体校的优势,推迟危机的出现。而事实上,“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会导致“体教结合”难以顺利推进,而另一方面,业余体校危机日益加重,最终会导致丧失发展良机。第三,利益格局支配。“体教结合”会全面冲击体育局系统的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比较看重这一点,但他们却忽视了在“体教结合”中产生的新的发展和生存机遇,抱残守缺。毫无疑问,在“体教结合”中大量的高水平的教练员,要来自体育局的少年体校等机构,但很多人却看不到这一点。有的人错误地认为,搞“体教结合”等于“引狼入室”,把自己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让。体育局应该在总体规划,全面布局的基础上把体校的教练员与所有的中小学挂靠好,把这批教练员使用好、管理好、培养好。研究认为把这批教练员使用好、管理好、培养好是体育局在“体教结合”中能够发挥的独特作用。第四,“体教结合”是一项大政方针,许多具体的配套政策一时还难以跟上。由于体育局的态度未能完全“明朗化”,从而导致政策和具体措施不能完全到位。致使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严重滞后。往往存在,出了问题之后,基层找领导。如学生运动员高中毕业时的升学问题。

在当前教育系统和学校对于体育专门人才培养尚未达到很高的高度去认识的情况下,体育局系统要抓住时机,积极推广和制定具体的政策。在“体教结合”中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和指导权。另外,体育局在体育专门人才培养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2 “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尚未建立,三大“瓶颈”使“体教结合”面临生存危机

3.2.1 学生家长和运动员“风险规避意识”大大加强 表1 学生运动员对将来取得好的训练成绩的信心(N=67)

	充满信心	比较有信心	一般	信心不足	根本无信心
频数	21	22	23	1	0
百分比(%)	31.3	32.8	34.3	1.5	0

从表1可以看到,虽然有超过64.1%的人对自己将来取得好成绩“充满信心”和“比较有信心”,但仍然有35.8%的人选择了“一般”和“信心不足”。这说明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对自己是缺乏自信的。尽管其缺乏自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这值得考虑。

表2 学生运动员对将来的打算(N=67)

	当世界冠军	运动健将,进入国家队	上好大学,抱希望	对体育不抱希望,或教练随意训练	听家长安排	没想过
频数	15	15	42	2	7	3
百分比(%)	22.4	22.4	62.7	3	10.4	4.5

表2显示,62.7%的学生运动员希望将来“上好大学”,而对“当世界冠军”和“当运动健将,进入国家

队”则动机不强烈。

表3 参加体育训练对于将来成材的风险(N=67)

	增加了风险	降低了风险	说不清
频数	8	36	23
百分比(%)	11.9	53.7	34.3

表3指出,53.7%的学生运动员认为“参加体育训练对于将来成材”是“降低了风险”,即超过一半的学生运动员认为参加体育训练为自己的未来发展增加了途径。这可能与他们看到师姐、师兄的今天就是他们自己的明天,与政策兑现及引导有关。这是当前对“体教结合”极为有利的一面,需要充分认识到它的积极意义。表4也可以做辅助说明。但另外仍有34.3%的学生运动员对自己的前途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表4 促使学生运动员从事体育训练的原因(N=67)

	自己家长不情愿	为了将来好成绩	多一个上一个喜欢	愿,是教在体育上不好,把体途径,多好中学	练看上的有好的出路	育作为退路一个希望
频数	28	9	8	1	18	7
百分比(%)	41.8	13.4	11.9	1.5	26.9	10.4

表5 学生运动员在训练和学习之间的态度(N=67)

	学习	训练	训练和学习	说不清
频数	17	13	29	5
百分比(%)	25.4	19.4	43.3	7.5

表5显示,学生运动员在对待学习和训练的态度是多种多样的。这说明学生对自己的前途时常在思考。

表6 学生运动员从事体育训练是否有出路(N=67)

	有	没有	说不清
频数	26	21	18
百分比(%)	38.8	31.3	26.9

表7 学生运动员对前途的担心(N=67)

	训练耽误学习,怕上不了大学	训练出不了成绩,白辛苦	没有文化,以后不好就业	其它
频数	41	12	10	4
百分比(%)	61.2	17.9	14.9	6

表6、表7表明了学生运动员对自己前途的种种忧虑和担心。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思考自己的前途,并尽量减少风险。一方面说明了仍有一部分学生运动员对体育的前景比较看好,另一方面有61.4%的学生运动员害怕“训练耽误学习,怕上不了大学”。目前,在人们的眼里,上大学是风险最小的,上了大学就意味着将来会有一个好的出路,也就意味着将来的就业和生存的压力大大减少。另一方面,摆在人们面前的现实是,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将是必然趋势,同时也就意味着年复一年,上大学的难度将一年比一年降低。人们必然要思考,从事体育训练能为他将来带来什么。因此,如果没有必要的政策推动和吸引,并且还暗藏着如此多的风险,人们必然会避而远之。退一步说,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外省市资源,从外引进,但我们不妨分析一下,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深入,10年以后外省市也会面临着上海市同样的问题。因此,立足上海市自身,适当引进作为辅助途径,可能是长远之计。

表8表明了学生运动员对从事体育训练在前景上看好的方面,这是值得我们在制定政策时要考虑到的因素,需要充



表8 学生运动员从事体育训练的出路 (N=26)

	可以出名, 路子广, 有一个不妨碍退下后, 其它可以赚钱 办事容易 好身体 上大学 还可以做别的工作					
频数	10	9	16	12	6	1
百分比 (%)	38.5	34.6	61.5	46.2	23.1	3.8

充分利用。

表9 学生运动员从事体育训练没有出路的主要原因 (N=21)

	学习耽误, 今后会很惨	成绩不好, 上不了大学	随便上个大学, 比当运动员风险小	出运动会成绩难, 不保险	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
频数	4	14	4	7	1
百分比 (%)	19.0	66.7	19.0	33.3	4.8

表9显示学生运动员对自己未来的种种忧虑。这是很正常的, 这些风险需要我们从政策上加以规避, 使大多数学生运动员没有后顾之忧, 安心于体育训练。并从总体上稳定和壮大体育训练的队伍。

表10 学生运动员对将来的选择 (N=67)

	学习文化, 上大学, 有保障	当运动员, 有钱, 有名	又上大学, 又当运动员	选择其它途径
频数	29	8	24	3
百分比 (%)	43.3	11.9	35.8	4.5

表10表明, 43.3%的学生运动员看重文化好, 能上大学。另外也不排除仍有35.8%的学生运动员既想在体育训练上取得成绩, 有所发展, 但又希望能将风险降到最低限度。

3.2.2 “上行途径”不畅制约“体教结合”生存与发展

表11指出, “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是“管理体制不顺, 很难解决学生向上输送问题”。表12认为, 学生运动员向上输送的途径“基本畅通”(83.3%)。基本畅通不等于完全畅通, 也就是说还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政策, 还没有变成一种“常态”制度。

除了在制度和政策上为新的“体教结合”体制做出保障之外, 就是要提供向上的路径。第一, 高校系统里没有健全的“体教结合”体制作为保证。例如, 排球项目, 也只有华师大开设, 金融学院为击剑项目, 学生没有选择的余地。有的高校虽然已经建立起了高水平运动队, 但也只是一两个项目。还有很多的项目无所着落, 这为高中毕业的学生寻找出路上设置了无形的障碍。第二, 高校普通公共体育教师, 由于其自身缺乏参加高水平运动训练和竞赛的经历, 很难胜任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任务, 也严重地制约了“体教结合”的实现。所以, 尽快实现市体工队建制在高校, 初步实现体工队与高校的结合, 解决高水平运动队教练员问题是当务之急。第三, 由于学生运动员高中毕业后, 要么去市体工队, 要么选择去高校, 而大多数高

校又没有建立高水平运动队, 即使这些学生运动员到了大学在体育上也难有作为, “体教结合”也没有发挥应有作用。解决好“上行途径”已迫在眉睫。

3.2.3 后备人才来源缺乏、“下行途径”闭塞使“体教结合”处于危机边缘

表13 学生运动员后备来源的充裕度 (N=6)

	后备生源非常多	后备生源比较多	一般	后备生源不多	后备生源非常缺乏
频数	0	1	0	3	2
百分比 (%)	0	16.7	0	50.0	33.3

表13显示, 后备人才来源缺乏已经引起广大教练员的忧心。从整个竞技体育来看, 后备人才缺乏的危机已经出现。主要原因有: 第一, 我国多年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 独生子女普遍。不愿让孩子吃苦, 是父母的普遍心理。第二,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发展, 高等教育趋向大众化, 子女成功和成材的机会增多,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得到缓解, 上大学变得更加容易。第三, 从事体育训练的风险性很大。在上大学变得容易的情况下, 人们就想尽量规避风险。因此, 怎样让家长规避风险, 或者说将潜在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 解决后备人才危机, 这是我们政策部门急需考虑的事情。只有在具体的政策上体现出来, 才是解决竞技体育人才危机的根本。例如, 在幼儿园时期, 家长都让孩子参加游泳训练, 目的在锻炼身体, 全面发展, 但到了小学阶段让孩子从事游泳专项训练, 大多数家长都回绝。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面临严重危机。例如, 昆明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共有9个年级, 共有9名教练员, 平均每名教练员带不到10名左右的学生运动员训练。复兴中学排球队招生, 每年男女各7个名额, 但总体上都招不满。

除了要降低学生家长的风险危机之外, “下行途径”也缺乏制度保障。按照“一拖三”的要求, 即1所高中下面按照3所初中配备, 1所初中按照3所小学配备的原则, 当前都没有办法落实。没有形成供需关系, 缺乏政策支持。即使27所二线中学有指定的初中, 但初中也缺乏生源, 没有小学为它提供生源, “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下行途径”解决不好受多种因素影响: 第一, “上行途径”解决不好, 也会影响到“下行途径”。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果。第二, 家长的风险意识。第三, “一拖三”政策未能落实。

3.3 “体教结合”在学校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但需要进一步营造好的环境

3.3.1 “体教结合”得到教练员的基本认可, 但学校育人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

从表14可以看出, 50%的教练员认为应该“将各区少年体校合并到学校, 组成学校运动队”。少年体校是我国竞技体

表11 与同级别少年体校相比, 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N=6)

	管理体制不顺, 很难解决学生向上输送问题	管理体制不顺, 后备选拔出现问题	经费不足	场地条件不够	读训矛盾突出	教练员人事关系不顺	家长不支持	学校的工资待遇不理想	运动员素质太差	没有合适的竞赛参加, 影响训练积极性	运动员没有激励机制
频数	4	1	1	1	4	1	1	2	0	0	1
百分比 (%)	66.7	16.7	16.7	16.7	66.7	16.7	16.7	33.3	0	0	16.7



表 14 少年体校与学校运动队的依存关系 (N=6)

将各区少年 学校运动队 学校办 不好 取消学
体校合并到 和少年体校 运动队 回答 校运动队
学校, 组成 并存, “两 多余,
学校运动队 条腿” 走路 必要

频数	3	2	1	0	0
百分比 (%)	50	33.3	16.7	0	0

育培养的一种特殊形式, 为我国竞技体育“冲突亚洲, 走向世界”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乃至目前仍然是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不可多得的重要场所与途径。其它途径无法替代。但是, 随着我国体育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市场经济社会的逐步建立, 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暴露出来。如, 粗放发展模式的人力、物力、才力的巨大浪费, 运动员没有经受过比较系统的义务教育和文化学习, 运动员的退役安置问题, 以及社会资源调动不够等等, 都向现有体制提出挑战。所以, 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走“学院式”道路, 可能是今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走向。

表 15 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是否赞成 (N=6)

	非常赞成	赞成	一般	不赞成	很不赞成
频数	1	4	1	0	0
百分比 (%)	16.7	66.7	16.7	0	0

表 16 教育系统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体制前景 (N=6)

	非常好	好	一般	没有出路	完全没有出路
频数	1	2	3	0	0
百分比 (%)	16.7	33.3	50.0	0	0

表 15、表 16 显示, 对学校作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场所大多数人是持赞同态度的, 并对其前景充满希望。这说明, 竞技体育后备培养走“学院式”发展是顺应国情、民意的。

表 17 学校的大环境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是否适合 (N=6)

	非常适合	适合	一般	不适合	非常不适合
频数	1	2	3	0	0
百分比 (%)	16.7	33.3	50.0	0	0

表 17 回答“非常适合”和“适合”的一共为 50%, 说明了目前学校的大环境对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还不是十分有利的。表明现在, 学校应试教育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另外, 学校对学生的成材观也有不同的看法, 过于重视文化成绩是学校的普遍现象。而对于既要搞好训练, 同时又要搞好文化成绩的运动员来说, 要求有点不切实际。学生也难以做得到。

3.3.2 学校为运动员提供的训练时间基本能满足训练要求

表 18 学习和训练的冲突 (N=67)

	有很大冲突	有冲突	一般	没有冲突	完全没有冲突
频数	4	23	30	6	4
百分比 (%)	6	34.3	44.8	9	6

表 19 平均每天安排的训练时间 (N=6)

	不足 30min	30min ~1h	1h~ 1.5h	1.5h ~2h	2h~ 2.5h	2.5h 以上
频数	0	0	0	3	3	0
百分比 (%)	0	0	0	50.0	50.0	0

表 20 目前给运动员安排的训练时间的满足程度 (N=6)

	严重不足	比较不足	一般	比较满足	全部满足
频数	0	1	2	3	0
百分比 (%)	0	16.7	33.3	50.0	0

表 21 学生的学习和训练是否能兼顾 (N=6)

	能	能, 但需 要学校较 好的管理	能, 需要 学生较强 的自制力	不太 可能	完全 不能
频数	2	3	1	0	0
百分比 (%)	33.3	50.0	16.7	0	0

从学生的调查看出, 表 18 显示“有很大冲突”和“有冲突”两项加在一起共计 40.3%, 认为训练和学习还是有一定的冲突的, 但不是十分严重。27 所二线中学大多属于市重点高中, 学生文化成绩总体水平非常高。对于文化基础在进入重点高中前本身就不好的学生运动员来说, 来自文化学习上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要想学习上在班上不掉队, 就希望能花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 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 学生运动员都是分散插在普通班上, 班主任和任课教师为了不影本班的文化总体水平排队, 其显示出忧虑和关心, 也会无意识地给学生运动员流露出压力感。

表 19 显示, 学校安排的课余训练一般在 1.5h~2h 和 2h~2.5h 范围内。认为业余训练时间“比较满足”的占 50% (表 20), 绝大部分教练员认为“学生的学习和训练能兼顾” (表 21)。这从总体上说明学校安排运动训练与文化学习之间还是能够兼顾的, 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体教结合”在学校有生存的基础。根据我们的调查发现, 运动队的训练一般都安排在下午 3 点钟以后和星期六, 下午 3 点以后学校在这个时间段全部停课, 安排学生自由活动。例如, 昆明学校、复兴中学。所以, 在这个时间段安排训练, 对学习的影响不是很大。从表 11 也可以看出, 教练员对“读”、“训”矛盾的担心。站在教练员的立场上看, 任何一个教练员都希望给运动员的训练时间是越多越好, 因为有量的积累才有质的飞跃。对教练员的主观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3.3.3 校园文化学习环境和训练条件对学生运动员成长比较有利

表 22 和表 23 说明, 大部分学生对学校的学习和训练条件是满意的, 这有利于训练队伍的稳定和壮大。原因是这 27 所试办二线中学都是条件很好的市重点中学和条件好的中学。学校有运动场、体育馆 (个别没有), 校园环境好, 文化学习条件优越。

表 22 学生运动员对学校的学习条件满意程度 (N=67)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频数	17	33	14	1	3
百分比 (%)	25.4	49.3	20.9	1.5	4.5

表 23 学生运动员对学校的运动器材、场地满意度 (N=67)

	非常满意	满意	一般	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频数	16	29	20	0	0
百分比 (%)	23.9	43.3	29.9	0	0

表 24 学生运动员选择的训练地 (N=67)

	少年体校	中学	其它培训学校或中心
频数	14	45	5
百分比 (%)	20.9	67.2	7.5



表 24 说明,大多数学生愿意选择在中学接受业余训练。

表 25 与同级别少年体校相比学生运动员的优势 (N=6)

	运动员文化素质高,对教练员的思想理解较快	不愁校园环境好	校园训练热情高	学生有学校、体育局的双重关心	学生有奖学金,有动力
频数	2	0	4	2	5
百分比 (%)	33.3	0	66.7	33.3	83.3

表 26 与同级别的少年体校相比学生运动员的劣势 (N=6)

	在竞赛来源上不对称,参赛信息封闭	训练时难以保证,读训矛盾	训练经费不足,训练场地不够	学校领导向上输送有问题	体育局运动员后备人才选拔有向题
频数	1	4	1	1	0
百分比 (%)	16.7	66.7	16.7	16.7	0

表 27 与体校相比学生运动员感觉的明显进步 (N=6)

	运动成绩总体提高	向上输送员增多	运动员后备来源成问题	运动员文化水平提高	运动员积极性明显提高	运动员管理比较顺畅	运动员解决了很多问题	运动员为文化学习提供保障
频数	1	1	0	3	2	0	0	1
百分比 (%)	16.7	16.7	0	50.0	33.3	0	0	16.7

表 25、表 26、表 27 是对教练员的调查,学校的育人环境对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十分有意的。学生运动员在整个校园这个文化氛围之中,其学习基础虽然差一点,但在学习上也不敢怠慢。这与在少年体校相比,学习你上看看我,我看看你,缺乏赶超的氛围的“破罐子破摔”是不一样的。

表 28 学校对学生运动员训练的支持 (N=6)

	非常支持	支持	一般	不支持	非常不支持
频数	1	3	2	0	0
百分比 (%)	16.7	50.0	33.3	0	0

表 29 学生运动员参加训练的积极性 (N=6)

	很高	较高	一般	不高	不愿意练
频数	0	4	1	1	0
百分比 (%)	0	66.7	16.7	16.7	0

表 30 学生运动员参加体育训练的喜欢程度 (N=67)

	很喜欢	喜欢	一般	不喜欢	很不喜欢
频数	21	35	11	0	0
百分比 (%)	31.3	52.2	16.4	0	0

表 28 显示,学校领导对“体教结合”工作总体是支持的。学生参加训练的积极性也是比较高的(表 29、30)。这可能与学生在这样一个好的学习环境里预示着有一个好的出路有一定的关系。

综上所述,学校环境对学生运动员的成长是比较有利的。

3.4 学校单一的人才培养观念和“应试教育”对模式运行产生阻碍

在调查中发现,学校单一的人才培养观念和“应试教育”对“体教结合”运行产生某种不利影响。27 所二线中学中,绝大部分是市重点高中,市重点高中追求的是升学率,其评估标准是以每门功课的人均分数高低为基准,而参

加高考的学生运动员也是学校毕业生中的一分子,也要计入平均分,由此必然会降低整个学校和班级的平均分水平,为此,影响学校的整体声誉,导致校长对“体教结合”不热心。另一方面,在日常工作中,校长希望学生花更多的时间在文化学习上,而教练员的主观愿望是应该在训练上花上足够的时间,以便提高运动成绩。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再次,运动员的竞赛成绩好坏对学校不会产生大的影响。我们在访谈中,很多体育教研组长认为“学校领导的政绩工程害人”。因此,改观目前的单一人才的培养观念,加强对体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形成素质教育的良好文化氛围,是当务之急。

3.5 教练员工作任务过重和业务提高缺乏相应的政策机制,不利于“体教结合”的正常发展

“昆明模式”,由于教练员归属于业余体校,教练员的日常任务是训练,工作相对单一,工作任务相对较轻。而“杨高模式”,由于教练员属于学校编制,既要承担体育课的教学,又要担任训练工作,工作压力和任务都比较重。具体表现在:第一,当前中学里的工资有一部分跟课时多少挂钩。教师上的课越多,课时津贴越多。这迫使教师要完成一定量的体育课时。在我们调查的学校里面,除了每天的训练课之外,他们每周一一般还要担任 16 节以上的体育课。因此,在这种高负荷下运转,而且又要保证训练任务的高质量完成,其达成程度可想而知。从长计议,专职教练员负责训练比较合适。第二,“杨高模式”中的绝大部分教练员没有高水平运动训练和竞赛的经历,而要想带出一支高水平的运动队,其业务水平是远远不够的。但目前仍然对他们没有相应的业务培训政策和措施。所以要想通过学校来培养高水平运动员,无非是天方夜谈。很多教练员在谈及这个问题时都表示自身由于没有高水平的训练和竞赛经历而存在不足,并希望得到业务培训。减轻教练员的工作任务,或者是启动专职教练员队伍,定期组织教练员培训是“体教结合”得以真正落实的根本保证。当前的基本现实是,中小学校和高校的绝大部分体育教师都是从体育院系毕业,当过运动员的并具有高水平训练和竞赛的经历者是极少数。所以,教练员的选用和培训制度是“体教结合”能否真正落到实处的重要措施。

3.6 体育局系统不追加经费投入,会严重地制约“体教结合”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挫伤基层的积极性,同时,也会给自身带来“边缘化”

在我们访谈的过程中,多位体育组长认为,体育局系统没有向学校进行经济投入。学校的训练和比赛经费一般来自校外赞助和学校自身的投入。在“体教结合”的初期发展阶段,由于训练和比赛经费短缺,会严重地制约“体教结合”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会挫伤基层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当教育系统自身具备足够的实力,以及大的教育环境的改观,而这时体育局的业务指导属于多余时,体育局系统就不得不从“体教结合”合作伙伴中逐步“边缘化”,并最终导致自动退出。因此,体育局系统应该主动迎接挑战,以便在“体教结合”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4 对策与建议

4.1 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有条件区县进行试点工作,将业余体校实行拆、并改组,建立“昆明模式”或“杨高模式”,并以“昆明模式”为主



第一, 体育局应该在全市范围内对“体教结合”实行总体规划, 拟在2010年完成全市“体教结合”布局。①要对全市的大中小学的场地设施情况进行全面摸排; ②对项目布局情况进行全面规划; ③对教练员进行基本配备; ④对体育局系统的现有场地设施按照就近原则充分利用; ⑤大中小学改革全面开花。

第二, 为减少风险, 从2007年开始, 分步骤, 拟在有条件的区县进行试点工作。“有条件”是指, 有的区县愿意首先吃“螃蟹”的, 愿意在改革中最先尝试, 有开拓精神者。或者, 有的区县在后备人才培养中遇到问题最多的, 责令首先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 原有业余体校学生根据项目、年龄、学历等情况进入相应的学校和班级。最后, 不再保留各级业余体校。为了配合试点区县改革, 拟在部分高校配套建立“昆明模式”或“杨高模式”, 以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第三, 在权衡“昆明模式”和“杨高模式”, 以及教练员的现状, 建议建立以“昆明模式”为主, 以“杨高模式”为辅的发展思路。对于体校来讲, 一方面通过学校可以彻底解决运动员的文化学习问题, 另一方面可以减轻体校自身的实际负担。对于学校来讲, 体校教练员有运动经历, 一方面解决了教练员业务水平问题,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体育教师的工作任务都很重, 既要担任上课, 又要从事专项训练, 很难胜任这项工作。

4.2 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 并保证畅通

能不能建立起完全畅通的“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是“体教结合”成败的关键。基本思路是: 第一, 在“体教结合”的初期阶段, 高中、初中和小学可以按照“一拖三”的比例进行布局, 当“体教结合”进入成熟阶段之后, 可以有条件的打破“一拖三”的固定格局, 实行跨校、跨区招生。第二, 有条件的大型综合性大学责令其建立5~10个项目的运动队, 教练员由市体工队教练员担任, 运动员实行比较灵活的学分制, 充分利用就近的原有体工队场地进行训练。基本思路是: ①将市体工队的运动员作为过度期分批进入高校, 成为高校运动队成员。最后, 不再保留市体工队。②为了引入竞争机制, 在全市高校统一布局的情况下, 可以允许不同的高校建立相同项目的运动队, 以便高中时期运动员向上输送时有相对多的选择余地。

4.3 为“体教结合”学校配备好业务精良的教练员队伍, 并建立定期培训制度

教练员队伍的稳定和质量是“体教结合”成败的基本保证。第一, 要想使教练员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去, 让其刻苦钻研业务, 必须要把各级教练员从其它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减轻他们的工作压力和任务。因此, 除保留原有少数业务精良的教练员(其人事编制归学校管理)之外, 其它教练员全部由体育局系统指派, 教练员的人事编制由体育局系统统一管理。第二, 建立定期培训制度。

4.4 体育局系统要增加经费投入, 力争在“体教结合”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在“体教结合”中心最急切的应该是体育局系统。教育系统培养人才的目标是各式各样的人才, 体育专门人才只是其中之一。而体育局系统则面临

着全运会和08奥运会之后的走向问题, 在原有业余体校培养体系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之时, “体教结合”问题的提出和实施, 对于体育局系统来说是新的发展机遇, 无论是从上海市的体育事业发展着眼, 还是从自身的生存着想, 体育局系统要通过经费投入、政策的制定, 人事管理等方面, 力争在“体教结合”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4.5 为“体教结合”营造良好的校园硬、软件环境

第一, 体育局系统要从外部对教育系统推行素质教育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学生运动员不参与毕业生文化成绩平均分评价的客观依据和要求。第二, 通过在区、市级、全国运动会上实行按学校排名, 奖励取得贡献的学校和个人。第三, 在学校系统实行体育局命名的体育奖学金, 突出体育局系统的导向地位。第四, 在学校系统对校园群众性体育活动开展突出的学校实行奖励, 扩大体育局系统在学校中的影响。

5 结论

5.1 “杨高模式”、“昆明模式”, 是现行“体教结合”中的两种基本模式, 体育局在“体教结合”中其核心地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市体育局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在有条件区县进行试点工作, 将业余体校实行拆、并改组, 建立“昆明模式”或“杨高模式”, 并以“昆明模式”为主。

5.2 “小学——中学——大学”一条龙的培养体系尚未建立, 三大“瓶颈”使“体教结合”面临生存危机。学生家长 and 运动员“风险规避意识”大大加强。“上行途径”不畅制约“体教结合”生存与发展。后备人才来源缺乏、“下行途径”闭塞使“体教结合”处于危机边缘。

5.3 学校单一的人才培养观念和“应试教育”对模式运行产生阻碍。“体教结合”在学校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但需要进一步营造好的环境。“体教结合”得到教练员的基本认可, 但学校育人环境有待于进一步改善。从时间上看, 学校为运动员提供的训练时间基本能满足训练要求。校园文化学习和训练条件对学生运动员成长比较有利。

5.4 教练员工作任务过重和业务提高缺乏相应的政策机制, 不利于“体教结合”的正常发展。要为“体教结合”学校配备好业务精良的教练员队伍, 并建立定期培训制度。

5.5 体育局系统不追加经费投入, 会严重地制约“体教结合”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会挫伤基层的积极性, 同时, 也会给自身带来“边缘化”。体育局系统要适当增加经费投入, 力争在“体教结合”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

参考文献:

- [1] 卢志成, 刘华荣, 裴琨. “体教结合”与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J]. 辽宁体育科技, 2004(6).
- [2] 胡鹤雄, 陈文耀, 姜国安. 从上海市闸北区的实践看体教结合工作的制约因素与发展对策[J]. 上海体育科研, 2003(6).
- [3] 秦文宏. 上海地区竞技体育发展的问题与思考[J]. 安徽体育科技, 2005(5).
- [4] 冉强辉, 郭修金. 上海市“体教结合”运行现状与对策研究[J]. 2006(1).

(责任编辑: 何 聪)